

教育新观察

培训机构“馅饼”诱人,家长如何不落“陷阱”

潘尚理

名师执教、“四校”老师上课……机构“师资牌”水分太多

一家机构有没有资质,这其实是市场管理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对于绝大部分家长并无实际意义。我们所说的培训机构,基本分为证照齐全的培训学校和作坊式经营的小型工作室。

前一段时间,上海对教育培训市场开展轰轰烈烈的整治。因而,家长们或许会发现,现在去报班的时候,所有机构基本都会声称自己是有资质的。但请大家注意,所谓的“有资质”,应该指的是有照有证,即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证齐全。而我们检验这些机构是否有资质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看对方能否开出培训费的正规发票。

再说师资。对学生和家长而言,师资的好坏远比培训资质重要,也是家长给孩子报班时更迷信、更盲目的地方。但凡是个机构,都会说他们那里的师资特别好。这里,我们就举一些常见的宣传材料作为例子——

套路一:“xx老师,知名院校理科院系毕业,擅长学生数学思维培养,所教授的学生屡获殊荣。”

这是一家位于复旦科技园的知名教育培训机构所作的教师介绍。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这样的介绍并无实际内容,空洞无物。孩子上完课后家长追问:“这个老师上课好吗?听得

懂吗?”孩子特别开心地回答:“听懂的,老师还表扬我了,给了我奖品。”并随手拿出一颗糖。对于小朋友,她们特别尊重被称为老师的人,给予小恩小惠,便很容易成为老师的“脑残粉”,实际学习效果呢?堪忧。

套路二:我们这边的老师都是四大名校市重点的老师啊……

这是初中培训最常见的教师推荐词了。但真是如此吗?据笔者所知,少数教育培训机构的确有来自名校的老师,但如果把全上海培训机构号称“四校”老师的人数加起来,那恐怕会远远突破“四校”教师编制。

家长应明白:名校老师并不一定最适合您家孩子

曾经有一次帮朋友代课,机构负责人给了我一个“新身份”:一所名校的资深教师。他在跟学生介绍我的时候,我的汗都快滴下来了。当时我还年轻,却被叫作资深教师,不就是变相说我老吗?

据我所知,还有一些中专老师也摇身一变,到培训机构教授高中课程,结果一上课,学生反映上课内容跟教

材不一样,才漏了馅儿。

还有机构雇佣科技老师冒充名校物理老师、让大学毕业生扮演青年骨干教师,为的只是降低课时成本,可以达到利润最大化。但这些老师对于教材的把握程度都不准确,学生在那里学习,往往事倍功半,达不到预期效果。

说了这么多,家长肯定要问,既

然机构“套路”这么多,那么破解方法是什么?我的建议是,问清楚这家机构是哪儿请来的老师,信息越详细越好,越详细越靠谱,藏着掖着不愿意说的,还是建议家长另换一处上课吧。

此外,家长还需要认识到:名校老师并不一定是最适合您家孩子的,能提升孩子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才是适合您家孩子的最好老师。

培训班连报价格低廉?那是惯用销售手段

接着,我们来聊聊收费招生里的“套路”。近两年来,不少机构出现了秋季班和寒假班连报,寒假班和春季班连报的收费手段,希望家长一次性付款越多越好。究其原因,是因为寒假时间较短,又连着农历新年,若不连报,经常会出现寒假班招生人数锐减的情况,所以不知哪位商界奇才想到了这么一招,由此提高了寒假

的报班率。这一营销手段在机构间传得很快,大家纷纷效仿。

除了销售手段,还有营销策略。教育机构的营销,更多的是口碑营销,那么,如何将口碑传播出去呢?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在学转发营销文章,并以此作为优惠的条件,并且如果多人一同报名,还能享受一定折扣优惠,亦或给予一定数量的免费课程。

当然,之后的课程需要另外购买。

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销售手段?建议家长们睁大眼睛,挑选靠谱的老师,不盲目听信网络营销自媒体的营销内容。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仅仅是被“连报”价格低廉所“诱惑”,到时人坑容易,出坑难,退费往往没有收费那么爽快。

“利”字当头,很多机构的排课数量已超过学校授课时间

最后说一下培训机构的课程和课时安排。小学阶段课程名目众多,比如,现在特别热门的跨学科多角度研究(STEM)课程。但是在不少机构,该课程变成了几节乐高课、几节机器人课和几节实验课的合体——典型的概念炒作!同样的炒作,还有创意思维课、数学思维课等等。

相比之下,初高中阶段的课程就没有小学那么多花头,一般会有普通班、提高班、突击班、承诺班等不同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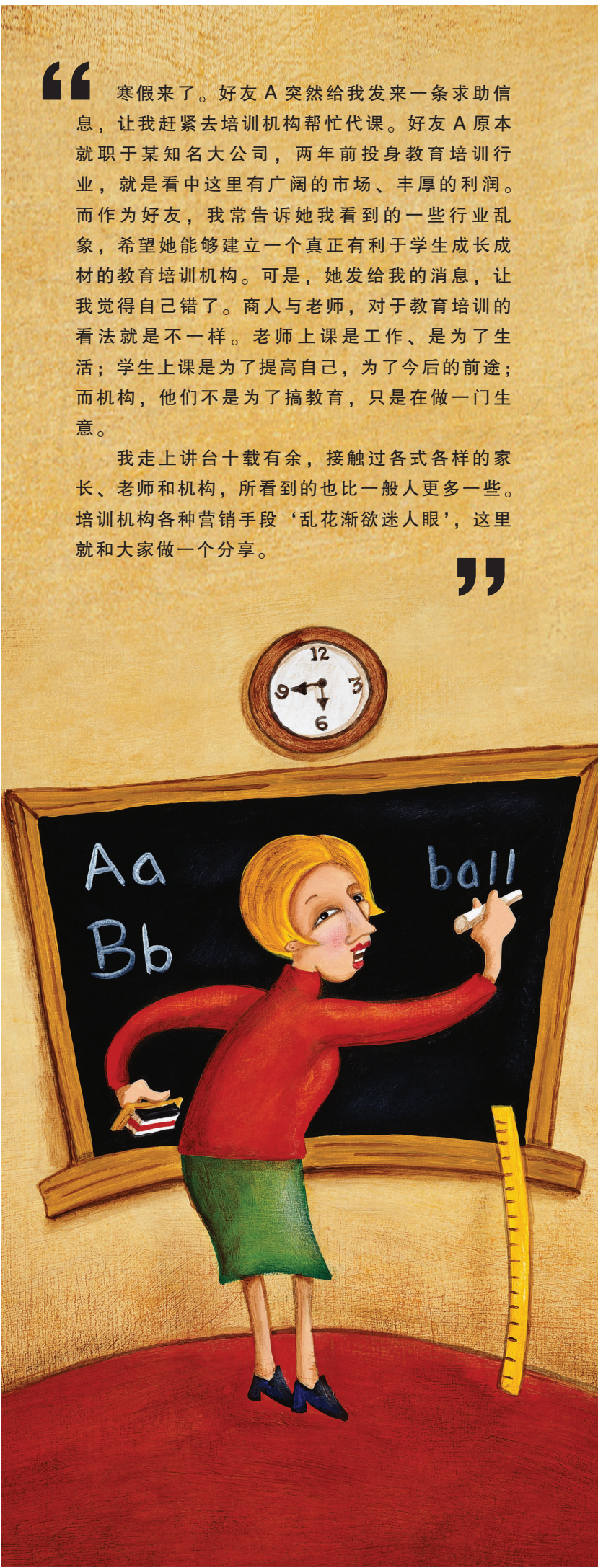
其实,普通班和提高班,就是最基础的班级。如果是同一个老师上,那课程内容基本一致,最多就是进度上的差别,不要指望老师会因材施教。

所谓的“突击班”,往往是机构在考前临时加出来的班级,在原有生源的基础上,对一些没有信心的学生再“磨上一遍羊毛”,一般费用也会略高。而“承诺班”,这其实是机构利润最高的一块蛋糕了。因为“承诺班”的策略是通过收取较高学费,用概率测算来提高收益,考试后真正能够享受退费的学生只是极少数,所以机构特别乐意开设这样的班级。

至于课时安排,我也来帮家长们算一笔账。现在学校的课是40分钟一节,语数外的话,一周大致在5节课,也就是200分钟的样子;小学科一般2-3节,也就是80-120分钟,一学年两学期,大概36个教学周。再看机构

的排课,一节课90分钟-120分钟,按照通常每学期16课时,寒假6课时、暑假12课时,一年基本在50节课。简单计算就可以发现,机构的课程数量甚至会超过学校的授课时间,有没有这个必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也就是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头,和好友A对话后特别生气的原因。

说了那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机构培训中的“套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必要去额外补习。补习,是因人而异的,适时适度的校外培训是学校学习的一种补充。但是家长和学生们必须要清醒一点:不能盲目地相信培训机构,该怎么选择,我想各位家长应该懂。



一名“90后”大学生的乡村支教手记 “那些关于孩子的小事,无不触动着我们的心灵”

邵将

五年前,我和八位支教的同学一起来到贵州省最南边的一座小县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在那里的特殊教育学校里,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需要帮助的智障孩子,他们很重感情,每次我们离开,总是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很远很远……在另一所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小学里,许多孩子的心愿本上写的是“希望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一顿饭”,让我每每想起来都不由地心酸。

与贵州的这些孩子们匆匆告别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但从此,“乡村支教”几个沉甸甸的大字,于我变得不再陌生。碰巧今年我的老师戴清教授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申报的《中国传媒大学师生文艺教育扶贫项目》获批,我的心再次雀跃起来。

今年1月3日下午,颠簸的车辆载着我们支教团队成员驶入英雄故里——山西省吕梁市的大美沃土。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飞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焦煤味。但当绵延起伏的吕梁山以银装素裹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一切的不适都像是被这自然的明净涤荡尽了。

真正让我们这些“90后”青年文艺志愿者震撼和留恋的,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孩子们。我们在讲课过程中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无不在触动

我们的心灵。

我们是“90后”志愿者!

对极度缺乏音乐教育的当地小学来说,我们支教团队成员、太原师范学院赵丹老师的音乐课可谓“雪中送炭”。赵老师为小朋友们讲授五线谱和简谱,孩子们的灵气让人欣喜,学得快、记得快,音准好、节奏棒。一堂课下来,赵老师超计划地教了两首歌。孩子们大都没有五线谱练习册,却用心地打着格子、对照着黑板抄乐谱。时而有孩子扬起小脸,跟来听课的老师低声耳语:“下星期还能上这个课吗?”课程在赵丹老师长笛演奏《欢乐颂》的乐曲中结束,孩子们快乐又意犹未尽的眼神让人难忘。看着这么容易满足的孩子们,我的心情挺复杂的。

我的师姐下天歌给孩子们讲的影视鉴赏课形象生动,她向孩子们娓娓叙述经典电影《音乐之声》中玛利亚修女和上校的孩子充满爱和欢乐的故事,通过多媒体设备播放电影中的歌曲《雪绒花》和《哆来咪》。歌声婉转悠扬、深情款款,孩子们细细聆听、静静品味,陶醉之情呈现在一张张小小的脸庞上,仿佛跳动的音符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泛起了幸福的涟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天歌师姐问孩子们:“还不想看像《音乐之声》这样的好电影?”一个孩子勇敢地站起来

说:“我想看很多很多电影,我想去很多很多地方,但是电影院在城里,看电影太贵。老师,您能带我去看吗?”孩子的率性与洒脱来得如此轻描淡写,令人猝不及防,我的心再一次被击中中了。

我在这里上的是书法课。故事天地、成语乐园、交流分享……几个环节下来,一个小时已经过去,孩子们乐此不疲,我却满头大汗。在游戏互动环节,作为代表的三个孩子在黑板上写粉笔画字,我在下面指导其余的孩子们练习钢笔字,其中一幕让我难忘: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支已经用过半截墨水的笔芯在皱皱的小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笔头和笔杆连接处的凸起将他的手指弄得通红。当时的我还有点诧异:“换支笔吧,孩子。”“老师,我……”支支吾吾的口气和空无他物的课桌让我了然一切,我赶紧奔向讲台,将早已准备好的用作礼品的签字笔和笔记本拿出来交给他黑黑瘦瘦的小手上。小男孩腼腆地笑着,嗫嚅着道谢,我竟有点儿不知所措。

英语口语课堂上,我们派出的是已经在托福和雅思考试中取得高分的“英语超人”何晨光师妹,她耐心细致、又蹦又跳地教孩子们学唱英文歌曲《新年好》。孩子们学得劲劲,唱得卖力,迅速学会了这首歌。随后在英语做自我介绍时,一个女孩用英语划着介绍了家里的第四个成员——

只猫咪,它陪伴着10岁的她共度了五年的童年时光。女孩讲述时,眉宇间、眼神里透露出无限爱意,听得老师们同学们心里也是满满的感动。

暂时的离别,也是新的开始

最后一眼透过玻璃窗回望小学教室,“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太原师范学院师生文艺支教活动”的红色条幅依然高悬在黑板墙上,为寒冬增添了几许暖意,连同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和期盼的眼神,一起留在我的视线里、心田里。

离别,在频频的挥手致意中瞬时被放大。小孩子不懂伤感,只是听到我们说“再见”时,会羞涩地摆摆手,小声地说以后会想我们。我信,大家都信。在去吕梁车站途中,我在前面开路,甚至不敢回头看。因为看到他们,我会想起那根被碳素笔芯弄得通红的手指,那只不过作为家庭成员陪伴了小姑娘五年的猫,那张对孩子们来说很是奢侈的电影票,那声为配合我们拍照、孩子们齐刷刷喊出的“茄子”,以及那句怯怯而充满期盼的低语:“你们以后还来吗?”

不道离别,因为它实在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即将到来的春天,我们和吕梁孩子们的故事,还将继续……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2017级博士生)



谈谈师生间的“干私活”关系

张剑光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一名博士生自杀,舆论一边倒地认为,导师的不当行为是导致学生自杀的主因。目前,学校已经做出回应,取消了该导师的招生资格。

舆论向来是比较关注弱势群体的,这一事件发生后,网上声讨女导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平心而论,这位女导师确实有错——有些私活不应让学生做,有些话确实讲得过头了点、随意了点,老师和学生本不应这样随意地说话。毕竟,师生有别、男女有别。

不过,作为一名高校一线的教师,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对研究生和导师干私活关系的一些想法。

某次会议,一位老师谈到,他是明确将师生关系界定在教和学上的。老师是全心全意地教,学生是全心全意地学,但千万不能认为学生与自己有更亲近的关系。

对此,我并不完全同意。在我看来,老师不但要用自己的知识教导学生,更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换句话说,我和我的研究生的关系,就是不同于我和一般学生的关系。我也承认,因为有这样的观点,因而与学生说话时,有时免不了不随意,常常问长问短,很多时候甚至还会敞开心扉掏出心里话去教育学生。

那么,引申开来再讨论一个问题:师生之间的“干私活”,可不可以?至少我认为可以的,但不能超过“度”。

回忆起我自己做学生时,也替导师干过私活。比如读本科时,朱瑞熙先生调到上海,家中的家具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到火车站搬运的。当时还没见过朱先生,也没有一分钱报酬。唯独班长说了一句,到了晚饭时间,我们应该到办公室主任家去汇报,顺便“骗”顿饭吃。到了主任家,人家说,饭还没吃吧?我们一个个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有老练的班长说:“还没吃。”于是办公室主任把我们几个苦命的学生招呼进家,鸡蛋炒年糕,还有美味的方腿肉,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肚子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走人。时隔多年,每当想起这事,印象里留下的只有办公室主任家的美滋滋的饭菜香。

记得我读硕士时,导师生病,我们几个学生赶到医院陪护,睡在床底下,先是一人每周陪护一天,后来是每两周一天。我们陪导师,无怨无悔。理论上讲,这个也属私活,但当时学生们的确没想这么多。导师平时真心对我们,我们陪导师一夜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当老师以后,带了学生,也让我学生干过私活。比如,学生答辩面试,我会让其中一位学生做记录。有一位想考博士的外地姑娘到上海,碰巧我在学校的奉贤校区,也是让我的另一位学生接待她,来来往往一整天。有时,我的书稿弄好后,也会让学生去查核一下资料。有一次我的办公室要从八楼搬到十楼,几乎全是几位男生替我搬运。当然,这里要郑重声明的是,我的车从没让学生擦过,也没让学生陪我逛街。

所以,无论是学生替老师干点活,抑或是老师也替学生干点活,全在于一个“度”。一学年偶然叫一二次,占用半天一天时间,这个并不为过。人际交往中,一般的同事邻居之间,不计报酬地帮人家干几次活,也不是什么大事。相互帮一把,普通人之间尚能做到,师生之间有何不可?就我而言,有时也会帮学生干点私活。我帮学生干私活可能更多地是帮学生不计报酬地改稿子。有时我接了编著之类的话,分给学生写,稿费和署名全归学生,但其中的修改却是很多的,如果学生将原稿和最后出版的稿子核对一下,马上会发现差距。老师帮学生,也是师生良好关系的一种体现,并不值得计较什么。

现在的师生关系,当然不同于古代的师徒。师父的吃喝拉撒不能靠学生来侍侍,至于师生之间的喝酒、挡酒,也是偶一为之。比如,同事知道我不胜酒力,常常嘲讽我,同在场的学生就会很关切地看着喝红了我的,甚至某次一女生气地端起一小碗黄酒,敬其中一位老师,再一碗敬另一个老师。女生悄悄地对我说:“老师,我没事的,白酒可以喝一斤。”几位同事见到我有这样豪气的学生,也只有羡慕的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和同事之间的喝酒纯属娱乐,从没强迫劝喝的,从根本上说,既不会强迫学生喝,也不要学生为老师挡酒。

说到底,师生关系毕竟不是普通人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有真感情在。你伸出一只手,我也会伸出一手。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